



山西地方史研究

第 二 輯

山西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組編

4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地方史研究

第二輯

山西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組編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太原

山西地方史研究

第二輯

山西大学中国古代史教研組編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晉出字第二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 6 $\frac{3}{4}$ 印張 • 149,000 字

一九六二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八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3,000册

目 录

山西古代学者在史学上的贡献·····	班书閣 (1)
武士彠生平探索·····	罗元貞 (32)
李福达事迹考·····	王守义 (53)
赵城先天教曹順的反清起义·····	罗元貞 (67)
辛亥太原革命目睹記·····	薄桂堂 (90)
明代会(汇)票制度和山西票号的关系·····	王守义 (94)
河东盐池史略·····	康秋泉 (107)
晋祠文物辨正·····	張亦彭 (126)
大同史略·····	張效禹 (139)
刘祁北使記箋注·····	閻宗临 (152)
刘郁西使記箋注·····	閻宗临 (160)
紅罗鏡 略注·····	郝树侯 (177)
編后記·····	(212)

山西古代學者在史學上的貢獻

班 书 閣

我国文人，一談到古代的史学家，誰也忘不了孔子。因为他整理过我国第一部上古史“尚书”，又著过魯史“春秋”，而春秋笔法，尤其被封建社会的史家奉为准则。实则当时史籍可与“春秋”媲美的，尚有“晋乘”和“檮杌”；所以孟子說：“晋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不但把这两部书与春秋并称，且把“晋乘”列于第一，可见“晋乘”的价值，决不在春秋之下。“晋乘”的作者，虽已无考，但敢定其为当时晋国人，亦即今之山西人。自春秋时候，山西人在史学上已有这样的伟大貢獻，无怪乎后来名家輩出，爭創体例。茲择其有特殊貢獻的，汇成此篇。其属于一般性的，則略而不录。

一 董狐和虞卿在史學上的貢獻

山西有两位大史学家，一位是董狐，在孔子之前；一位是虞卿，在孔子之后。这二位的貢獻，是在“史德”上。

(1) 不怕死的直笔史学家董狐 董狐是春秋时候晋国的史官。当时的晋灵公，很是残暴，并且还謀害他的大臣赵盾（也称赵宣子），于是赵盾就逃走了，因而引出以下的事故。

乙丑，赵穿（赵盾之侄）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

山而复（未出国境而归）。大史（即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

“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我之怀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哉！（左传宣公二年）。

杀晋灵公的，固然是赵穿，董狐認為赵盾的逃亡并沒出境，分明是假逃，回来又不杀他侄子，說明赵穿的弑君，赵盾并不反对，所以董狐記載这一事件，說是“赵盾弑其君”，这是他“誅心之論”，在史法上叫做“直笔”。后人之所以尊重董狐，主要是叹服他不怕死的精神，因为在董狐之后，齐国的史官，就是这样被杀的。齐国的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

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尽死，执简以往，聞既书矣，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从这件事看来，董狐是冒死而为，就无疑問了。所幸者，赵盾尚顧大体；所以孔子除称贊董狐外，跟着又說：“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以示公允。

齐国这几位史官，也很受后人的称頌，尤其对南史氏，把他和董狐并称为“南董”。这种史学家都名之曰：“直笔”或“直书”，受人称許，反之則名曰：“曲笔”，遭人指斥。

在阶级社会里，固不可能有真正的“直笔”，尤其是在阶级立場上，对人民的史实，很难做到正直不曲。不过二者比較起来，号称直笔的史学家，終胜于号称曲笔的，董狐在史学上的貢獻，主要是他有忠于历史記事真实和敢于做斗争

的正义感。

(2) 刺譏国家得失的史学家虞卿 虞卿是战国时一位乡里无考的人。司马迁说：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担簦，說赵成王，一見賜黄金百鎰，白璧一只；再見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史記平原君虞卿列传）。

这是他被称为虞卿的由来。“卿”是他的爵位，又何以曰：“虞”呢？裴翺集解云：

譙周曰：“食邑于虞”。

司马贞索隐云：

赵之虞，在河东大阳县，今之虞乡县是也。

索隐所說的“虞乡”，即唐宋以来山西之虞乡县。他的食邑既在“虞”，姓的代表又是“虞”，他一生的事业，又在赵国，因此我們把这位失去乡里的先賢，只有列为山西人。

虞卿在赵时，因“长平之战”，赵国大败，虞卿极力反对赵国割地与秦講和；他的主张，結果未得实现。他又“东見齐王，与之謀秦”（史記本传）。后因受魏齐（人名，魏相）的牽連，离开了赵国，困于大梁，因而著书。这就是他一生的主要事迹。史記本传说：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魏齐赴赵魏两国进行合縱，为秦国所忌，求魏齐甚急，牽連到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間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也說：

赵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

篇，为虞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虞氏微传二篇”，儒家有“虞氏春秋十五篇”，皆曰：“虞卿撰”，与史记所说篇数不同，且多“虞氏微传”一书。这可能是司马迁著史记以后汉人把其书分为十五篇，又摘其中有关春秋部分，别为“微传”二篇。清人梁玉绳就是这种看法。这是另一问题，我们不细作研究，仅借此说明虞卿之书，至汉犹存而已。

此书久已失传，然就以上的记载，可看出两个特点：一、汉书艺文志，既把他的“微传”列在“春秋家”，其内容一定对春秋有所阐述，因此就不能把他和作晏子春秋的晏婴，作吕氏春秋的吕不韦等，一样看待，而应当把他当作史学家；二、他“不得意乃著书”，意在“刺讫国家得失”，必能揭露出当时统治阶级政治上一部分的黑暗，有一定的进步性。他的贡献在此。其书之不传，或亦在此。

二 郭璞在史学上的贡献

郭璞字景纯，晋代闻喜人。永嘉之乱，中原淪陷，政府南迁，璞亦避地过江，被元帝任为著作佐郎，迁尚书，后为王敦所杀。其词赋为东晋之冠，著作颇富。晋书（卷七十三）本传云：

璞撰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为“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仓”、“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

据其著述，已可看出他不仅是个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懂

得卜筮之術的唯心論的哲學家。他在史學上的貢獻，就是他所注的“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因為這兩部書是有問題的，且關係着他的學術思想，在介紹上，還要多說一些。

(1) 山海經注 “山海經”一書，首見於史記大宛傳，司馬遷說：

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信。

史記未云何人所作。今郭璞注本，卷首有西漢劉秀“上山海經表”，稱為夏禹的臣“伯益”所作。這當然不可靠，但這樣說法，並不僅他一人。如：吳越春秋吳王無余外傳、王充論衡別通篇、也是說“益”所作。隋書經籍志，鄭道元水經注洧水注、劉知幾史通雜述篇、又都說是“禹”所作，尤為妄誕。據明、清和近人的考證，大概“是古代的巫書”

（魯迅中國小說史），到戰國時，由於文化的發展和地理知識的擴大，“好古之士，雜錄而成”（明胡應麟筆叢）。其中又有秦、漢的郡縣如：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等名，可見又有一部分是“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四庫全書總目）。這話是有道理的。

此書今本存十八卷（隋、唐二志皆云二十三卷），書中分南山、西山、北山、東山、中山、大荒西、大荒北、大荒東、大荒南、海內、海內南、海內西、海內北、海內東、海外南、海外西、海外北、海外東，各經（非原次序）。除記錄山川名稱形勢外，夾雜着許多的神話故事，太史公謂“余不敢信”，即為此。

歷來各家，著錄此書，都以為地理書之冠，東漢明帝并賜“（王）景山海經、禹貢圖、河渠書以治河（後漢書王景傳）可見古人對此書的重視。惟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以其參雜有神怪故事，著錄於子部小說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

四十一)，其书既以叙述地理为主，仍应以列入地理类为是。

隋志和唐志，又載有郭璞“山海經图贊”二卷，今本已无，清人郝懿行著“山海經箋疏”时，就有贊的明藏經本，將贊一卷附于卷末，图則仍闕。郭璞对于此书既努力作注，又为作图作贊，可見钻研很深。

“山海經”固多怪誕，而其所載山川事物，亦多信而有征。我們絕不能因其含有怪誕，而不重視。其可信不足之處，賴郭注而得備，璞之功實不可沒，其怪誕之處，因郭注而益彰，也是應批判的。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山海經是研究古代地理不可缺少的書籍之一，郭璞的注，對我們的研究上幫助極大。

(2) 穆天子傳注 “穆天子傳”是西晉初年，汲冢中出的竹書，經荀勗整理，郭璞作注，書始可讀。內容記周穆王西征，見西王母事，也夾雜着不少誇張的神話。晉書束皙傳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發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台西王母。

晉書武帝紀，亦載此事，惟發墓說是在咸寧五年，略有不同。荀勗云：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寫并付秘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荀勗穆天子傳序）。

書之來源，大致如此。周穆王曾經遠游，也是見于經傳

的。左传昭公十二年云：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車轍馬迹焉。

史記（卷五）秦本紀云：

造父（人名、秦的先人）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溫（或作盜）驪、騊駼、騄耳（良駿馬名）之驥，西巡，乐而忘归。

“穆天子传”就是記这件事的专书。书中把他所到的地方，所过的山川，所見的事物，和怎样北絕流沙、登昆仑、見西王母，怎样交酬娱乐，以及見美人盛姬的死事，皆記載頗詳。书共六卷，用編年体。名为“穆天子传”，实关于大西北史地的一部古书，文字古雅，大概亦战国时好异之士所作。郭璞好之，故为作注。自云：

汲郡竹书（指竹书紀年）及“穆天子传”，穆王西征，見西王母，执璧帛之好，献錦組之属。穆王享王母于瑤台之上，賦詩往来，辞义可观。……乃取其嘉禾、艳草、奇鳥、怪兽、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烛銀之宝，归而殖养之于中国。史記說“穆王……見西王母乐而忘归”；亦与竹书（指紀年）同。左传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竹书所載，則是事也（郭璞山海經序）。

按史記并无“見西王母”的話，郭言殊失其实。且后人之不信，乃是不信其怪誕处，而璞則認為完全可信，亦未免太好异聞了。

此书隋志和唐志，都著录于“起居注”类，宋志著录于“別史”类，晁公武郡斋續志，著录于“传记”类，都有道理，惟清修四庫全书，著录于“小說家”类，殊属非是。提

要云：

此书所記，虽多夸言寡实，然所謂西王母者，不过西方一国君，所謂县圃者，不过飞鳥百兽之所飲食，为大荒之圃泽，无所謂神仙怪异之事。所謂河宗氏，亦仅国名，无所謂魚龙变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犹为近实。

既云其“近实”，又何必目之为“小說家”，这又是四庫全书的失当处。

郭璞注这两部书，是有功績的，我們也要有批判的去看他。从他整个的學問來說，也是历史上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尤其他所注“尔雅”，价值更高，决不能因其好异，降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三 聞喜裴氏在史學上的貢獻

我国史学界，若龍門司馬氏、扶風班氏、吳興姚氏，都能子繼父业，后世传为美談。实則山西的聞喜裴氏，在史学上更是名家輩出，而裴松之、裴駰父子和松之的曾孙裴子野，对于史学，貢獻尤大，即班馬二氏，亦难专美于前。

(1) 晉代裴秀在制图学上的貢獻 秀字秀彥，河东聞喜人。三国曹魏时，官至尚書仆射，曾助魏改定官制。晉武帝代魏以后，封巨鹿郡公，进为司空，以职在地官，作“禹貢地域图”十八篇。晉书本傳說：

以“禹貢”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說者，或强牽引，漸以暗昧；于是甄擿旧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笔注列，作“禹貢地域图”十八篇。

其繪法据自序云：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絕域殊方之回，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同上）。

禹貢一篇，虽是战国时人的假托，但拿他作为战国时期的地理去研究，还是有必要的。裴秀此图，对研究者，确有很大的帮助。其繪法不但在当时是个創举，即在科学进步的今日，也是適合人們要求的。

（2）南朝三裴在史学上的貢獻 南朝三裴，即裴松之父子和其曾孙裴子野，在中国史学界都是杰出的人物。

（甲）創补注体的裴松之 松之字世期，河东聞喜人。南朝刘宋时官国子博士，文帝因陈寿所撰三国志过于簡略，命松之为之作注。于是：

松之鳩集传记，增广异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

自上三国志注表云：

其寿所不載，事宜存录者，則罔不毕取，以补其

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矯正，以懲其妄。其時當否，及壽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辨（三國志卷首）。

此其作注的大致體例。四庫全書總目，又進一步給他總結為以下六端：

一曰引諸書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

這個分析，比他自己說的還要顯明和完備。他的特點：第一，過去注史者，都是僅注字音、字義和對名詞、地名、人名的解釋，他這注法，劉知幾名之曰：“補注”，實則補之外，還作了備異、考證等工作，確是個大的創造。第二，注中引用書籍，達一百四十餘種，在分量上，比陳壽原著，多出三倍，對研究三國時事者，確予以很大的便利。第三，所引史料，多首尾完備，不大加剪割，當魏晉旧籍，大部分早已失傳的今日，使我們尚能見其梗概，更起了保存史料的作用。雖其中有時嗜奇愛博，不免雜蕪之病，然仍是瑕不掩瑜。

松之在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的宋史，未成而卒。此外尚著有“裴氏家記”三卷。

（乙）首注史記的裴駰 駰字龍駒，松之之子。劉宋時，官南中郎參軍。司馬遷的史記，傳到劉宋，已五百餘年，中間未有為之作注者，現傳之注本，實以裴駰的“史記集解”為第一人。其自序云：

此書（史記）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實，

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質，眞偽舛雜。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訓解（裴駰史記集解序）。

其书虽参考徐广的“史記音义”，但他另外引用的书，还是很浩博的。

司馬迁的“史記”，多根据先秦旧籍，文本难讀，“疏略抵牾”的地方，又所在多有，后世讀者确感困难，幸有裴駰首为作注，学者始有依賴。刘知几称他：

开导后学，发明先义，古今传授，是曰儒宗（史通补注篇）。

在裴駰之后，又出現了唐代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张守节的“史記正义”，所以刘知几說他是“开导后学”，可見創始者的重要。

（丙）撰宋略的裴子野 子野字凡原，父昭明、为裴駰之子，所以他是松之的曾孙。子野初仕南齐，为江夏王參軍，梁时为著作郎。著宋略二十卷，为当时編年体的名著。梁书本传云：

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約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刪，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評論多善，約見而叹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北地傅昭、汝南周舍，咸称重之。

同时范縝，亦称其书“属辞比事，有足多者”（同上）。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也說：“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其书虽已失传，其价值可以想見。

子野著述极富，見梁书本传，其中巨著，为“众僧传”二十卷。

(3) 裴矩、裴庭裕在史学上的貢獻 矩字弘大，河东聞喜人。初仕北齐，入隋后迁吏部侍郎。著有“西域图記”三卷。

煬帝即位，……时西域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記”三卷（隋书裴矩传）。

这是他著书的动机。其主要内容，据自序云：

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經蒲类海、鉄勒部。……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度葱岭，……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闐……度葱岭，……至北婆罗門达于西海。……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总奏敦煌，是咽喉之地（同上）。

其著书的意旨，显然是备统治者作为經略西域的工具。但自西汉以来，西域与中国内地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其山川风俗确有研究的必要，其书有图有記，在研究西域地理的貢獻上，其功实不可沒。

矩尚有“隋开业平陈記”十二卷（旧唐书本传），“大唐书仪”十卷，“高丽风俗”一卷，見旧唐书經籍志。

裴庭裕亦名廷裕，字膺余，河东聞喜人。唐昭宗时官翰林学士，左散騎常侍。著有“东观奏記”三卷。四庫总目云：“书中記事，頗具首尾，司馬光作通鑑，多采其說”。其书虽仅三卷，价值頗大。

以上即聞喜裴氏在史学上的貢獻。实則山西裴氏业史学的并不仅此，以其非聞喜人，故皆不举。

四 晋陽王氏在史學上的貢獻

晋陽王氏，业史学的，也是頗有其人，而其中則以王劭的貢獻为最大。

(1) 創制度史体例的王慧龙 慧龙太原晋陽（今太原市）人，仕北魏，因功賜爵长社侯。魏书本传云：

撰帝王制度十八篇，号曰：“国典”。

其书既名“国典”想即“通典”“通考”之类的“政书”，亦即制度史，我們虽不能說杜佑作通典是受他的影响，但不能不承認他在杜佑以前已开其端。

(2) 王遵业在史学上的貢獻 遵业为慧龙的曾孙。魏书本传云：

位著作郎，与司徒左长史崔鸿同撰起居注，迁右軍將軍，兼騎常侍，慰劳蠕蠕，乃詣代京（时北魏都洛阳），采拾遺文，以补起居注所闕。与崔光、安丰王延明等参定服章，及光为肃宗講孝經，遵业預講。并应詔作释奠侍宴詩，时人語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著“三晉記”十卷。

所作起居注，亦早失传，而刘知几曾說：

邢昺追撰孝文起居注，既而崔光、王遵业补續，下迄孝明之世（史通卷十二正史）。

可能唐时尚存，不然，刘知几是无从考知的。其“三晉記”可說是撰山西地方史的創始者。

(3) 富有創造性的史学家王劭 晋陽王氏，到了王劭，在史学上，放出了更大的光芒。劭字君懋，遵业之孙。隋文帝时，官著作郎，著有“皇隋灵感志”三十卷、“隋书”